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圆世纪中国翻译史(修订版)轱 华文著援—西安 :西北大学
出版社 圆园园愿

摇 陈犀 怨愿原苑原缘园原原缘愿原原

摇 I 援圆缘摇 II 援方援圆摇 III 摇翻译 原语言学史 原中国 原圆世纪
IV 援员缘原圆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愿)第 员园园园号

圆世纪中国翻译史(修订版)

方华文摇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北路圆园号摇邮编 苑园园园 电话 愿愿愿愿愿)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愿愿毫米 伊元原毫米 员圆开本摇圆缘印张摇远千字

圆园愿年 远月第 员版摇圆园愿年 愿月第 员次印刷

陈犀 怨愿原苑原缘园原原缘愿原原

定价 猿园元

前摇言

我国译事发端于 猿 四 年 前 的 周 朝。据《册府元龟》的《外臣部·鞮译》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故《周官》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文中所引的“象胥”即指古代的翻译官。另据《礼记·王制》的记载，周朝对各方的翻译人员有不同的称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由此可见，那时译事在我国已见端倪，数千年来绵延不绝，并时有光大。各类《翻译史》、《论文集》多有记载。本书管窥清末民初时期，叙述的是“语际”翻译，即中文和外文（主要指西方文学）的互译活动。笔者欲将梁启超、严复及林纾称为当时的“译坛三杰”，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译业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无论在译品类型或翻译观念上都大有建树。三者中梁启超年纪最轻，翻译的作品最少，但他大力创办译书院，从政治的角度影响我国的译业，以宏观论作用最大，故列“三杰”之首。在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和茅盾不但叱咤文坛，且在译界也纵横捭阖，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故本书予以重笔浓墨。该书以时间为脉络，但界限并不严格，因为许多

优秀的翻译家都是跨时代的人 ,对于翻译家的人生经历及译绩 ,恕本书一笔带过 ,但对他们的译学观点则予以详细陈述 ,力图勾勒出我国译论建设的总路线。笔者尽量录用翻译名家的译学言论 ,为广大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立论的依据。该书的主旨是跳出象牙塔 ,以知识性及趣味性为特点服务于莘莘外语学子 ,帮助他们从史料中把摸翻译的脉搏。为创造直观的生动效果 ,为再现译者的风格 ,本书多处提供其译品片断(或诗歌 ,或散文 ,或小说) ,但一般不作技术性的评论 ,由读者裁定优劣。笔者认为外国翻译理论为中国的译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也活跃了我国理论家的思维 ,促进了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 ,但我国的译论不应失去自身的特色。翻译理论家们面对一味“ 崇洋 ” 的现象 ,提出了“ 建立中国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体系 ” ,并采取具体措施 ,总结和集中传统译论的经验和智慧 ,糅以西方理论之精华 ,构制成我国新译论的基本框架。中国翻译事业近 百年飞速的演进 ,以及翻译工作者的呕心沥血的努力 ,在本书中得到详细反映。当然 ,鉴于笔者视界有限 ,难免将一些贡献卓著者从“ 功臣录 ” 中漏掉 ,在此谨表歉意。

方华文

圆年 远月 愿日

前言 (员)

第一部分摇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 (员)

第一章摇梁启超对翻译的杰出贡献 (猿)

第一节摇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
..... (猿)

第二节摇译介东籍西学,深入研究佛经翻译
..... (远)

第二章摇译坛巨子——严复 (员原)

第一节摇非凡的人生及见识 (员原)

第二节摇《天演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提出)及其他严译 (员远)

第三章摇不懂外文的翻译奇才林纾 (圆原)

第一节摇《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
林纾传奇的翻译经历 (圆原)

第二节摇林译硕果累累 (猿远)

第四章摇清末民初时期的科学翻译 (缘远)

第五章摇小说翻译及其划时代的作用 (远原)

第六章摇诗歌翻译 (愿)

第七章摇外国戏剧的翻译及影响 (员远)

第八章摇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 (员员)

第二部分 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	(员圆)
第一章 摇大文学家、大翻译家鲁迅	(员圆)
第一节 摇创作与翻译并重	(员圆)
第二节 摇鲁迅的“硬译”理论	(员圆)
第三节 摇周氏兄弟协作译书	(员圆)
第二章 摇大文豪郭沫若的翻译活动	(员圆)
第一节 摇郭沫若的文学人生	(员圆)
第二节 摇从实践中总结出翻译观点	(员圆)
第三章 摇翻译主将——茅盾	(员圆)
第一节 摇作为文学家的茅盾	(员圆)
第二节 摇作为翻译家的茅盾	(员圆)
第四章 摇对俄苏文学的译介	(员圆)
第五章 摇中国文化传播输入俄苏	(员圆)
第六章 摇瞿秋白与翻译	(员圆)
第一节 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翻译情怀 ...	(员圆)
第二节 摇瞿秋白提倡以翻译丰富中国语言	(员圆)
第七章 摇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傅雷等人	(员圆)
第八章 摇洋博士刘半农与翻译的情结 ...	(员圆)
第一节 摇文坛和译坛显露才华	(员圆)
第二节 摇刘半农的翻译观	(员圆)
第九章 摇日本文学涌入中国	(员圆)
第十章 摇留英学子翻译结硕果	(员圆)
第十一章 摇莎士比亚在中国	(员圆)
第十二章 摇英国文学翻译群星灿烂	(员圆)
第十三章 摇德国文学在中国	(员圆)
第十四章 摇对美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员圆)
第十五章 摇对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	(员圆)
第十六章 摇对中国文化的译介	(员圆)



第一部分

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

自从鸦片战争战败之后 ,清王朝已走上了穷途末路 ,闭关锁国的墙垣随之坍塌。爱国志士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渴望接收到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文化 ,他们不满于现状 ,向旧的传统观念及文化全面宣战。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新思想的先行者及媒介的翻译界也顺应潮流大量译介域外的知识和文化 ,对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在悠久的中国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梁启超、严复和林纾并称为译界“三杰” ,不仅留下了一部部不朽的翻译作品 ,也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中国人落后的思想观念。外国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大量涌入给中国文化提供了相当先进的参照物 ,赋予中国文化新的内容和形式。与此同时 ,在广大译者的不懈努力下 ,璀璨的华夏文明也在域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第一章摇梁启超对翻译的杰出贡献

第一节摇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

梁启超(员愿猿猿~ 员愿肆圆)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文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自幼聪颖,愿岁学做八股文,怨岁落笔成文,人称“神童”。员远岁参加乡试,成绩斐然。主考官李端棻是名重一时的清朝大员,看中梁启超的才学,把妹妹许配给他。

员愿源年,维新运动由酝酿进入行动,梁启超步入政坛。员愿缘年源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集合员愿省的 圆园园多名举人在松筠庵开会,起草万言书,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梁启超在这段时期,基本通过三种途径促进维新变法:第一,利用学会,组织变法队伍;第二,通过办报、译书,宣传变法主张;第三,创建新式学堂,培养维新人才。

员愿源年愿月员怨日,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四马路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撰文反映民众呼声。员愿苑年末,梁启超赴长沙时务学堂,与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培养出 圆园园多名学生,其中的蔡锷、林圭和唐才质等人成为以后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梁启超在上海南京路创建大同译书局,宗旨为:“本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来变法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员愿愿年一年间,大同译书局便译出多种书,刊印出来的主要包括:《瑞士变政法》、《俄土战纪》、《地球十五大战记》、《日本书目志》、《中西学门径》、《新学伪经考》、《意大利侠士传》、《大同合邦新义》等。

员愿愿年苑月猿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官授六品衔,命办理译书局事务。同年怨月底,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帝,杀害了谭嗣同、康广

仁(康有为弟)等“戊戌六君子”,致使“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途中阅读了日本友人送给他的以汉字为主体的日本小说《佳人奇遇》。他心潮起伏,写下了著名长诗《去国行》,留下了悲壮的诗句: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纵,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1905年,梁启超结束了16余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了中国。他不愿成为袁世凯的鹰犬,躲进天津的梁宅——饮冰室,闭门做学问。袁世凯称帝后,他走出饮冰室,与弟子蔡锷一道发动“护国战争”,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

梁启超又回到饮冰室,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留给后世1600多万字的论著。

吴其昌纵览各大家的文章,指出谭嗣同、章士钊等人的文章都有其缺憾,然而对梁启超的文笔却极为称赞。他说:“……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撼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当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气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

梁启超在政坛叱咤风云,在文坛也是一个伟大的旗手。他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向传统的文学观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中国传统文学的理念是“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小说则是“诲淫诲盗”的下品。梁启超针锋相对地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把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在世人眼里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当时的文学潮流以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非但在理论上大造声势,实践中也身体力行,亲自创作小说,而且翻译了《佳人奇遇》、《俄皇宫之人鬼》、《十五小豪杰》、《世

界末日记》几部外国小说。

梁启超在翻译这几部小说时,用的都是易懂的白话文,与林纾和严复的古奥的译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但他的翻译包含着编译的成分,随意增删,为他心中已设定的“主旨”服务。我们不妨从他译的描写英雄少年历险的《十五小豪杰》^①中摘录一段列出: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叶孤舟
滚滚怒涛中几个童子

调寄摸鱼儿

莽重洋惊涛横雨,一叶破帆飘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龄乳稚。逢生处,更堕向天涯绝岛无归路。停辛^ㄟ苦。但抖擞精神,斩除荆棘,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开新土,赫赫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天不负,看马角乌头奏凯同归去,我非妄语,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

看官,你道这首所讲的是什么典故呢,话说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上满天黑云,低飞压海,^译咫尺不相见。忽然有一只小船,好像飞一般,奔向东南去,仅在那电光一闪中,瞥见这船的形儿。这船容积不满百吨,船名叫作胥罗,曾有一块横板在船尾写着的,但现在已经剥落去,连名也寻不着了。那船所在的地方,夜是很短的,不到五点天便亮了。但虽系天亮,又怎么办呢,风是越发紧的,浪是越发大的。那船面上就只有三个小孩子,一个十五岁,那两个都是同庚的十四岁,还有一个黑人小孩子,十一岁。这几个人,正在拼命似的把着那舵轮。忽然,砰訇一声响起来,只见一堆狂涛,好像座大山一般,打将过来。那舵轮把持不住,陡地扭转,将四个孩子都掷向数步以外了。内中一个连忙开口问道:“武安,这船身不要紧吗?”

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紧哩,俄敦。”连忙又向那一个

^① 中华书局^{民国}年版。梁译本共九回,余九回由罗孝高续译。梁译本原无标点符号,现文中的标点由本书作者添增。

说道：“杜番啊，我们不要灰心哇。我们须知道这身子以外，还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哩。”随后又看那黑孩子一眼，问道：“莫科呀，你不悔恨跟错我们来吗？”

黑孩子回答道：“不，主公武安。”

这四个人正在船面，话未说完，那船舱楼梯口的窗户，突然推开。先有两个孩子探头出来。跟着又有一只狗，蹲出半截身子。那狗三声两声的乱吠。那两孩子里头，有一个年长的，约有十岁左右，急忙大声问道：“武安，武安，什么事呀？”

武安道：“没有什么，伊播孙啊，快回去罢，什么事都没有。”

第二节 摇译介东籍西学，深入研究佛经翻译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进行了深入思考，发现自己直接参与政治改革的愿望已化为泡影，于是便将全部精力都用于文化启蒙的宣传。从 1898 年至 1904 年，他以日文为媒介，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培根、笛卡儿、伏尔泰、卢梭及孟德斯鸠，乃至达尔文、斯宾塞、歌德等千余年的主要思想家、科学家的学说，通过译述、编译和述评的方式引入中国，而且，他还把自己崇拜的英雄，如法国的罗兰夫人、拿破仑，普鲁士的俾斯麦，美国的华盛顿，意大利烧炭党人和俄国“虚无党”的评传进行编译。同时，他又将国内已译出的西方书籍汇集起来，约有 140 余种，编成了《西学书目表》。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富民强，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康有为认为向日本学习的最佳途径就是翻译日文书籍。1898 年，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写到：“若因日本译书之成业，政治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起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但借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比之采译欧美之万难，前无向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哉！”

梁启超也意识到从日文译书比从英文简单易行，早在 1898 年他就在《变法通议》中提出：“日本与我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始，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

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近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少而获利甚钜。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也,故黄君^①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中国开始大规模翻译日文书,到20世纪最初几年间,日文书籍的翻译在数量上超过了所有西文书籍,占译书总数的一半强。据统计,从1899年大规模译日书起,至1911年民国成立,共译日书达2800种。

梁启超极力倡导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他在《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之利器》中介绍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功用:“于日本维新运动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翻译既盛,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治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故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

梁启超从中国逃亡日本的途中,曾读过《佳人奇遇》,后亲自将其译为中文,于1903年至1905年间连载于《清议报》。随后,《清议报》又登载了周遼翻译的《经国美谈》。

《佳人奇遇》是作者柴四朗根据自己游历欧美的经历创作的。书中有四个重要的主人公:留学美国费城的日本青年东海教士(作者的化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以及明末遗臣鼎泰珪(字范卿)。东海教士在美国见到幽兰和红莲,常和她们谈论民族兴亡、国家盛衰的政治问题,流露出民权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小说中呈现出美国的富强及其独立的民

^① “黄君”指黄遵宪,是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作为驻日使节出使日本多年,对日本非常了解。

族精神。

这部小说原像都是汉字,为不通日文的梁启超提供了方便。他在基本读懂原文的意思之后,处理字句时采取直译法,但整个作品改动极大,任意删减,实际上属于“豪杰译”,即译者以“豪杰”自命,不受原文束缚,任意添削、改动原文。在译本之末,他甚至为了申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竟然创作了一段加上去:“朝鲜者,原为中国之属土也。大邦之义,于属地祸乱,原有靖难之责。当时朝鲜,内忧外患,交侵迭至,乞援书至中国,大义所在,故派兵赴援。而日本方当维新,气焰正旺。窃欲于东洋寻衅,小试其端。彼见清廷之可欺,朝鲜之可诱也。遂借端扶植朝鲜,以与清廷构衅。清廷不察,以为今日之日本,犹是昔日之日本。亦欲因而惩创之,俾免在东洋狂横跳梁多事也。不谓物先自腐,虫因而生,国先自毁,人因而侮。歌舞太平三百载,将不知兵,士不用命,以腐败腐朽而且不通世故之老大病夫国,与彼凶性蛮力而且有文明思想之新出世日本,斗智角力,势固悬绝,故一举而败于朝鲜,再举而陷辽岛,割台湾,偿巨款。我日人志趣远大,犹以为未足也。”

从 1898 年至 1904 年,梁启超译了四种小说,均未产生大的影响。但他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翻译的《哀希腊》却独具特色,以其清新、流畅的风格大受人们的推崇。《哀希腊》一诗选自拜伦长篇诗体小说《唐璜》的第三章,是以“曲本体裁”译出的。梁启超在《饮冰室全集》第 14 册中写了一段话,可充为解释之词:“著者不以诗名,顾常好言诗界革命。谓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谓取索士比亚、弥尔顿、摆伦诸杰构,以曲本体裁译之,非难也。……顾吾以为译文家言者,宜勿徒求诸字句之间,惟以不失其精神为第一义。不然,则诘屈为病,无复成其为文矣。闻六朝唐诸古哲之译佛经,往往并其篇章而前后颠倒。参伍错综之。善译者固尝如是也。质诸著者及中西之文学家,以为何如?”

梁启超取原本中的第一节和第三节译出,其原文及译文如下:

摇摇我哀希腊,昔日之辉煌,今则如灰烬,散于尘埃。

摇摇幸甚,幸甚,吾人今日,得见此景,实为不幸。

摇摇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
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
如此好河山，也应用自由回照。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
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拜伦(即拜伦勋爵)的诗激扬清越,令人读之心潮澎湃。梁译之笔抓住了《哀希腊》的诗魂,起到了夺目摄心的作用。拜伦是英国19世纪初期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卓越代表。他以自己的创作和实际行动,热情而有力地支持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欧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他的诗歌创作对许多国家的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1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光》,对上流社会的生活进行讽刺。此后他思如泉涌,杰作接踵而出。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长篇叙事诗《唐璜》,诗中的主人公周游列国,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冒险和奇遇。该诗展现了19世纪初期欧洲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把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揭露和批判了欧洲各国贵族社会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愧为一部规模宏大的讽刺性史诗。其中对英国上层社会的批判和讽刺尤其深刻,也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拜伦笔下的贵族政客阿孟维尔公爵及其夫人,形象丑恶,反映出了伦敦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和灯红酒绿的腐败生活。诗人希望能唤起人民对黑暗势力的憎恨,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推翻人吃人的世界,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梁启超看中的正是他反叛的性格,渴望借他的诗句鼓舞中国人的斗志,向反动的封建势力宣战。

梁启超对翻译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亲自译书,而在于从一定的高度上引导翻译的潮流。他要求译者不但要注重选材,也要遵循翻译规则,如使用统一的译名等,而且还必须注意培养翻译人才。他在洋洋万言的《论译书》中明确指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书;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依照他的观点,首先必须慎重选择所译之书。当时的官府也很重视翻译,但关于军事的书籍却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梁启超指出:“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他认为凡是能维新救国的书,如法律书籍、史书、工艺书、农业书、经济学论著、哲学著作以及教材等当放在首位,同时应分出轻重缓急加以安排。

其次,应该制定翻译的规则,特别是必须统一译名。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编写出专门的书籍,对人名、地名、度量衡的翻译加以详细规定。

再次是关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俱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翻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活动,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基本功和掌握广博的知识才能够从事,而这种才能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掌握的。所以,他提出建立翻译大学堂,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

梁启超认为向西方学习,是衰弱的中国必须走的一条路。在1904年,他发表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回顾和分析了中国在近现代史中所发生的变化。他在文章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他分析了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在《饮冰室文集》中指出:“且论者亦知泰东西诸国,其盛强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

继而,他把俄国和日本作为由弱变强的典范进行了阐述,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斯岂非其明效大验耶。”如果向西方学习,就必须读西方之经典,翻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梁启超建议道:“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方,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

他提倡广大民众学习外国语,研读西方的书籍,积极地将西方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1904年,他在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东籍月旦叙论》,开篇便写到:“新习得一外国语言文字,如新寻得一殖民地,虽然,得新地而不移民以垦殖之,则犹石田耳。通语言文字而不读其书,则不过一鹦鹉耳。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

想输入中国。此非特由其中学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学亦有未足者耶?直至通商十年后之今日,而此事尚有不得不有待于读东籍之人,是中国之不幸也!然犹有东籍以为之前驱,使今之治东学者,得以干前此治西学者之蛊,是又不幸中之幸也!”

所谓“治东学者”,就是精通日语的人。梁启超认为在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学日本的学子之贡献要大于留学西方的人。他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指出:“一,由治西学者大率幼而就学,于本国之学问一无所知,甚者或并文字又不解,且其见识未定,不能知别择,其初学之本心,固已非欲求学理与通儒矣。而所以从师,又率皆市井阘阘之流,所以导之者,非学问之途而衣食之途也。虽其中能自拔流俗者未始无人,然已麟角凤毛矣。若治东学者,大率皆在成童弱冠以上,其脑中之自治力、别择力渐以发达,故向学之心颇切,而所获较多也。二,由欲读西文政治、经济、哲学等书而一一诠释之,最速非五六年之功不能,若幼童脑力未开,循小学校一定之学级以上进,则尤非十余年不可。向来治西学者,既无远志,又或困于境遇,不能卒业。故吾国寻常学西文之徒,其最高等者,不过有中学校毕业之资格而已,何怪乎精深之学问一无所闻也。若治东学者,苟于中国文学既已深通,则以一年之功,可以尽读其书而无隔阂。即高等专门诸科,苟好学深思者,亦常不待求师而能识其崖略,故其效甚速也。”

梁启超倡导以翻译传播文化,并且倡导译者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外文书籍。针对严复提出的桐城派古文“雅洁”的标准,梁启超提出批评道:“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

在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的极力推行下,非但在翻译界,整个中国都盛行起了“白话文”之风。《杭州白话报》(1905年)、《苏州白话报》(1905年)、《新白话报》和《宁波白话报》等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梁启超对我国的佛经翻译非常重视,对之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多有新的发现,他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他认为佛经的翻译应起始于汉桓、灵帝之间。以前的佛学家大都认为佛经的翻译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75年),即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人来中国译《四十二章经》,并藏于洛阳白马寺